

古人有新春试笔之说:一年之初,万物萌发,写字的人有了尝试新表达的喜悦。但2020年春,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一切,该如何试笔、言说、表达?

书,读不进去。写作?大脑也像窗外的街道,空寂,失神。埋头看了二十余部电影,屡屡走神,所有对白都能让我联想当下处境——一切电影主题都是人性,都是生死、爱、绝境、孤独。法国侯麦的镜头里,热烈的阳光、葡萄园、女子,像梦境。日本是枝裕和的叙事中,关于家酿果酒,有这样一段对话:“姐姐,要甜一点还是酸一点?”“酸一点。”“要浓一点还是淡一点?”“浓一点。”好电影,就是这样平和与日常,好生活也应该这样平和与日常。但今年春天,平和与日常,消失了。

新冠病毒疫情,将推动国家治理体制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,消除下一场灾难降临时的种种无助与无序。十七年前,在那一场春天疫情中出生的孩子,若能顿悟

“知行合一”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这些古老准则的现代性内涵,则算是这第二个异常的春天所给予的成人礼吧。两个春天,两次疫情,铭刻下一个知识分子的名字——钟南山。“独共南山守中国”(李贺),“惟有南山不改,旧时青”(晁端礼),“意气南山在,名声北斗垂”(曾几)……人们借唐诗宋词中这些句子,表达着人们对一个老人的敬意,以及对家国之未来的信念。这些天,我没有书写的冲动,尽管“无日不瞻望”“无夕不思量”(白居易)。

文学写作与现实之间,似乎存在一种时差,要么滞后,要么超前。滞后,就是保存记忆、固守良知;超前,就是成为“唯一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”。这些年,我们一直关注同道俊彦,对于二〇〇三年那一个非典型的春天,如何辨认与表达。曾经口水般泛滥的速朽文字,早已化为废纸。类似于加缪《鼠疫》那样的杰作,没有出现,因为我们缺乏目力、心力与笔力?如何揭示恐惧、预告危境,是一个难题。被疾病贯穿一生的作家伍尔芙,追问:“为什么生病没有像爱情、战争和嫉妒那样成为文学流行的主题,为什么身体的日常戏剧没有被认识到,为什么文学坚持将身体跟心灵、灵魂割裂开来?”似乎仍没有答案。遗忘2003年,就要接受今年春天的迎头痛击。惟有见证与言说,可以避免悲剧的重演。

“多病所须惟药物”(杜甫)。文学,固然不能像手术刀、药品那样了结瘟疫,但可以安抚心灵。日本近期捐献中国的救灾物资包装箱上,写下诗经与唐诗中的句子,使无数国人动容动情。

非常时期,上海评弹团的“网络”乡音书苑,每天下午播放一小时杨振雄先生(1920—1998)的长篇弹词《西厢》。

今年是杨振雄先生诞辰100周年。杨振雄和胞弟杨振言擅说《西厢》、《武松》两部书,一文一武,他们的艺术不仅丰富了评弹唱腔,还大大丰富了评弹的表演。

传统上认为,苏州评弹以“说噱弹唱”为主要的艺术表现手段,以至于有“听书”的叫法。一般说到“演”就是大幅度的“动作”,还见到有的演员将“书台”视为“戏台”,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动作很适合照相。“跳进”人物是评弹表演中不多见的形式,即一人分饰几个角儿,并随时转换,时而又以局外人的角度点评一番。人们通常用布莱希特的表演体系来概括这样的表演手法。

这次播放的《西厢》就令人“非看不可”,足见杨振雄在“演”字上的功力。杨振雄的“演”一般专饰一角儿,在《西厢》里或法聪,或张生,或莺莺,沉浸其中,不再“跳出”角色,加上弹唱与手面,使得弹词这门曲艺有了戏曲化的艺术

效果,这种手法可能其他艺术家曾有实践,但是于杨派的艺术中更加突出。这不得不提到杨振雄的昆曲修养。

大杨老师酷爱昆曲,并得到前辈大师徐凌云、俞振飞亲炙是众所周知的。他在自己表演中,在唱腔上吸收了昆曲小生的发声方式,在表演上也是大量运用昆曲的舞台手面和身段。杨振雄的唱腔称为“杨调”,初听不似评弹,而更像昆曲小生。

评弹演员要“演”戏,服装这一环,他们是不可能扮上的。我一直觉得台上见到“两件长衫”的演出,就像所见竖版繁体书籍,来得“正宗”些。道具的话,他们也只有把扇子(或加上一块手帕)。杨振雄使用的扇子柄柄精彩,从扇骨到扇面在评弹界是无出其右的。观看杨振雄的表演,扇子拿在手里的时间也是评弹界最长的一位。比如《武松》西门庆初会潘金莲时,西门

赏李芳园《促膝谈心图》

陈晚龄

遇新冠肺炎疫情发生,响应国家号召,闷在家里防止感染。哪儿都不能去,就有了空闲时间学习、增智与享受。

在窗明几净、水仙飘香的案头,沏一壶普洱熟茶,把手头几张近代民国国画家的作品慢慢翻着品味,真乃人生大乐。其中,一幅李芳园的人物画确实让人叹赏爱抚,墨韵清幽,足可把玩。

这是一幅一尺见方的册页,尺幅不大却画了两个人物。画的风格似任伯年,图上两位高士坐在山脚下促膝畅谈,画面正中一位高士一袭赭褐色衣,出尘脱俗。衣纹线条简练、勾写有力。人物高蹈神态,束发长眉,一丝不苟,表现了画家精湛纯熟的功力。画面上的枝干曲折横斜,回转有力。山脚下,绿色肉类植物,水墨双沟,填以浓墨绿色,笔法洒脱清逸,墨气淋漓蕴藉,笔致墨韵浑然天成。在这么小的幅内,画得如此精整工细、秀丽缜密,堪为佳作。

画上右上角几行题款:“达邦仁兄先生三十初度时庚辰重九之吉,芳园李润祝于沪上。”盖印“李润”白文。“庚辰”是1940年,李芳园画赠于书画同道杨达邦三十岁生日的贺礼。

李芳园(1883—1947年)名润,以字行,别署陇西布衣,室名怀翰斋。上海人。工山水、人物、走兽,画宗任颐,精研陈洪授笔法,笔法爽利,形象生动,尤以人物、走兽见长。曾任上海美专、新华艺专教师。1936年寓居沪上小北门南华成路10号。次年7月与姚墨村、陈栎生、沈一斋在上海新世界饭店2楼举办书画扇展。为海上书画联合会、宛米山房书画会、中国画会等会员。



新春如何试笔

汗漫

情、战争和嫉妒那样成为文学流行的主题,为什么身体的日常戏剧没有被认识到,为什么文学坚持将身体跟心灵、灵魂割裂开来?”似乎仍没有答案。遗忘2003年,就要接受今年春天的迎头痛击。惟有见证与言说,可以避免悲剧的重演。

“多病所须惟药物”(杜甫)。文学,固然不能像手术刀、药品那样了结瘟疫,但可以安抚心灵。日本近期捐献中国的救灾物资包装箱上,写下诗经与唐诗中的句子,使无数国人动容动情。

玉骨还疑天上仙

施之昊

效果,这种手法可能其他艺术家曾有实践,但是于杨派的艺术中更加突出。这不得不提到杨振雄的昆曲修养。

大杨老师酷爱昆曲,并得到前辈大师徐凌云、俞振飞亲炙是众所周知的。他在自己表演中,在唱腔上吸收了昆曲小生的发声方式,在表演上也是大量运用昆曲的舞台手面和身段。杨振雄的唱腔称为“杨调”,初听不似评弹,而更像昆曲小生。

评弹演员要“演”戏,服装这一环,他们是不可能扮上的。我一直觉得台上见到“两件长衫”的演出,就像所见竖版繁体书籍,来得“正宗”些。道具的话,他们也只有把扇子(或加上一块手帕)。杨振雄使用的扇子柄柄精彩,从扇骨到扇面在评弹界是无出其右的。观看杨振雄的表演,扇子拿在手里的时间也是评弹界最长的一位。比如《武松》西门庆初会潘金莲时,西门



世纪之交,我在市郊田园派出所当所长,那里是一片开垦的热土,有上百家加工厂,大量的民工居住在辖区的出租房里,人员频繁流动,临时户口申报率很低,违法犯罪人员隐匿其间,案件频发,每日派出所要接到几十起报警电话,所里几十名警力疲于奔命。隔三差五,所里倾其全所警力,扑向各个来沪人员集聚地房屋实施“清查”,将那些不报临时户口,来路不明的来沪人员收容遣返。这种花大量警力成本、治标不治本的做法,既与改革开放和国家鼓励农民工入城打工的政策相悖,又使辖区治安的依法治理埋下隐患。

彼时,上下都在思索探寻良策。我和所里的民警花了一番功夫,对辖区做了全面的调查研究,心中渐渐有了“谱”。

梳理出租私房乱象,依法规范市场秩序从而抓好来沪人员落地管理是稳定地区治安的“牛鼻子”。然而警力从何而来?

我们需要“中国加油”这样的呼吁和行动,也需要“青山一道同云雨,明月何曾是两乡”那样的隽永与深情。

其实,“俗”“雅”并非水火不容,彼此滋养、纠正、转化,汉语才生生不息、充满活力。而语言的命运,正是人与一个国度的命运。有善意与悲悯眷眷在,这话语,无论入俗或脱俗,都是美的、好的。当下,各地出现一些“硬核”抗疫标语,触目惊心者多多,如同咒语和辱骂,充满凉薄和戾气。语言的粗鄙,就是人性的荒芜。在当下部分写作者当中,这样的粗鄙和荒芜,也是一种秘密流行的病毒。

“老去又逢新岁月,春来更有好花枝。晚风何处江楼笛,吹到东溟月上时。”明代诗人陈献章,在《元旦试笔》中如此咏叹。我喜欢。惟愿疫情速去,错过腊梅的人们,不再辜负玉兰、丁香、山茶等等好花枝。

大官人的扇子和《西厢》中张生手中的这把扇子,几乎是用“速写”的方式,使书中人物跃然纸上。

杨振雄晚年虽病魔缠身,仍潜心于整理话本小说《长生殿》的工作。曾有“抵拚减却十年寿,争写《长恨》百万言”的豪情。终于1998年3月由学林出版社出版,书名“长生殿”三字由俞振飞题写,封底用的是陈巨来为杨刻的洪昇名句“可怜一曲长生殿”朱文印。

杨振雄的表演总是“高高在上”,不是轻松休闲式的,而大有必须正襟危坐,方能欣赏的一种“严肃感”。这在于其表演的“戏剧化”,他的说书像演戏,好多艺术元素听众若一“怠慢”就漏过去了。在书画鉴赏时,我总说宋代绘画看起来比较累,因为一不留神,亮点就漏了。杨振雄的表演欣赏起来就有这样的特点。正因为这样使得杨派艺术不是评弹界最流行的流派。

同时,杨振雄的表演也不忘“噱”,留了一些轻松的成分给听众。大家还记得他和杨振言、杨鹗三人合演的《描金凤》中“弟兄相会”一折,在买跳蚤药

经济学法则告诉我们,市场秩序是利益各方良性博弈的结果,而各方合作是一剂良药,市场蕴藏着强大的力量。派出所联动地区税务、工商、房地部门和社区居委会,形成综治小组,着手组建统一的出租房屋管理服务社,由政府搭台,服务社“唱戏”,依托“4050”工程(组织40岁50岁待业下岗人员重返工作岗位),将闲置下岗的人员组织起来,在田园组建了六个服务站。户籍民警严格按照政府颁发的《出租房屋管理条例》运作,动员每个出租房屋的主人,签订委托出租房屋管理服务合同。合同的“亮点”是房屋委托服务社出租;服务社以“房东”名义再与承租人签约,从中开展对承租人身份信息核查、临时户籍申报、日常租赁管理当面提供服务,解决了原先租赁者双方信息

向市场要警力

戴民

生也无法履行督促承租人申报户籍信息的法律义务,自己也屡屡收不到租金,还为房屋承租人利用出租屋从事违法活动受到治安处罚“鸣冤叫屈”。张先生三套出租房委托服务社管理,服务社人员代理他从事日常管理和提供服务,房东不仅按期拿到租金,而且三套住房被管理得井井有条。

租赁房屋有个必要的前提,必须申报个人信息。之前,派出所户籍窗口数据显示,申报临时户籍信息最多达到四成,而出租房屋管理服务社正常运行后,申报

这段时间,众多小白领不得不选择在家做饭。刚开始摸索厨艺尝试煮鸡蛋,忽然记起在哪本书里看到,蔡琴的老歌《缺口》,只须歌者腔圆音正,速度始终,诚煮蛋之最佳计时器。置鸡蛋于沸水之中,开始演唱《缺口》,如需吃口嫩一点,唱至全曲末尾两句“在心里的缺口,让时间去填满”,恰熟矣;若需老一点,可唱第二遍,至“生命不断转弯,起起落落变成习惯”即可。歌词也应景,大半辈子提倡享乐主义的年轻人,一心一意地守在家里,在这场危机下,谁都不能,也不愿意做这座城市的缺口。

深知自己厨艺不精,身旁又无当炉文君,只能遥想上海那些引人遐思的旖旎美食。日前读《虹口区志》,上面记录了上海最早成市的乍浦路美食街。1988年下半年,24岁待业青年钱进,率先在乍浦路316号至318号开设“蒙利酒楼”。1989年乍浦路仅有13家餐饮店,1991年发展到27家。1992年,乍浦路美食街餐饮迅猛发展,餐饮酒楼达到76家。1993年,乍浦路美食街拥有各类餐厅、酒楼108家。夜幕降临,整条路上灯红酒绿,人头攒动,资深食客对这条马路上各饭店招牌菜如数家珍:“王朝大酒店”的牛肋排,“博世凯”的红烧肉,“丁香饭店”的大王蛇……

其实早在民国时期,乍浦路上就已餐厅林立。日本料理店有普通与高级之分,高级料理店又称“料亭”。据《虹口区志》记载,上海最早的日本“料亭”就开在乍浦路42号,名曰“藤村家”。老板娘本是艺伎出身,以一双纤纤妙手操理料亭。民国时期的上海作家林徽音(注:此人不是“太太客厅”的女主人林徽因)在他的《上海百景》里写道:陈列窗中是一瓶瓶的菊正宗,舞鹤,千福;还有应季节而给陈列着的立雏……那区域日本气息的浓厚远胜于霞飞路的俄罗斯气息。

乍浦路位于虹口区西南部,长约一公里多,南起北苏州路,依次北跨海宁路、武进路,并继续向北延伸至衡水路,与四川北路公园接壤。乍浦路辟筑于19世纪40年代末期,逐渐向北延伸至武进路,2002年延伸至新开辟的衡水路。当然乍浦路的传奇不仅仅是美食。

1912年冬日,刘海粟、汪亚尘、乌始光在位于乍浦路一家名为“宝亨”的西餐厅午餐,从窗门中望出去对面墙上贴了一张招租条子,餐后就去赁定那间房子。他们租下的房子是乍浦路8号。那一年,刘海粟16岁。1912年11月,刘海粟、汪亚尘、乌始光等人在乍浦路8号租一间洋房,创办“上海图画美术院”。这便是之后赫赫有名的上海美专的前身。

上海美专冒了许多天下之“大不韪”。先是1919年,该校在中国首次提出“不论男女均可入学”,实行男女同校制,后又将女性人体写生纳入课程。传奇画家潘玉良便在1920年第二批入学上海美专的女生名册中,当时的学籍登记册中她的名字叫潘世秀。还真是巧合,早年被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从妓院赎出纳为小妾的潘玉良,一直就居住在乍浦路上。1921年潘玉良考得官费赴法留学,先后进了里昂中法大学、里昂国立美专、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和意大利罗马国立美术学院。这个不寻常的女人1928年学成归国,受聘担任了母校上海美专的西画系主任。

黄蜀芹把潘玉良的传奇拍成了一部电影《画魂》,这几天在家无聊,想在电影里找找乍浦路的影子,翻来覆去地看,倒是发现了一个绝望的冬天之后总有一个希望的春天。

不对称、日常活动不见面,甚至承租人到期拖欠租金等纠葛。

张先生全家是动迁户,在田园分配住房三套,而他们全家仍留在市中心上班,将田园三套动迁房托人出租,承租人摇身一变,转租他人。最后,房东竟不知承租人究竟是谁,张先生也无法履行督促承租人申报户籍信息的法律义务,自己也屡屡收不到租金,还为房屋承租人利用出租屋从事违法活动受到治安处罚“鸣冤叫屈”。张先生三套出租房委托服务社管理,服务社人员代理他从事日常管理和提供服务,房东不仅按期拿到租金,而且三套住房被管理得井井有条。

租赁房屋有个必要的前提,必须申报个人信息。之前,派出所户籍窗口数据显示,申报临时户籍信息最多达到四成,而出租房屋管理服务社正常运行后,申报

乍浦路不仅仅是条美食街

沈琦华



其实早在民国时期,乍浦路上就已餐厅林立。日本料理店有普通与高级之分,高级料理店又称“料亭”。据《虹口区志》记载,上海最早的日本“料亭”就开在乍浦路42号,名曰“藤村家”。老板娘本是艺伎出身,以一双纤纤妙手操理料亭。民国时期的上海作家林徽音(注:此人不是“太太客厅”的女主人林徽因)在他的《上海百景》里写道:陈列窗中是一瓶瓶的菊正宗,舞鹤,千福;还有应季节而给陈列着的立雏……那区域日本气息的浓厚远胜于霞飞路的俄罗斯气息。

乍浦路位于虹口区西南部,长约一公里多,南起北苏州路,依次北跨海宁路、武进路,并继续向北延伸至衡水路,与四川北路公园接壤。乍浦路辟筑于19世纪40年代末期,逐渐向北延伸至武进路,2002年延伸至新开辟的衡水路。当然乍浦路的传奇不仅仅是美食。

1912年冬日,刘海粟、汪亚尘、乌始光在位于乍浦路一家名为“宝亨”的西餐厅午餐,从窗门中望出去对面墙上贴了一张招租条子,餐后就去赁定那间房子。他们租下的房子是乍浦路8号。那一年,刘海粟16岁。1912年11月,刘海粟、汪亚尘、乌始光等人在乍浦路8号租一间洋房,创办“上海图画美术院”。这便是之后赫赫有名的上海美专的前身。

上海美专冒了许多天下之“大不韪”。先是1919年,该校在中国首次提出“不论男女均可入学”,实行男女同校制,后又将女性人体写生纳入课程。传奇画家潘玉良便在1920年第二批入学上海美专的女生名册中,当时的学籍登记册中她的名字叫潘世秀。还真是巧合,早年被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从妓院赎出纳为小妾的潘玉良,一直就居住在乍浦路上。1921年潘玉良考得官费赴法留学,先后进了里昂中法大学、里昂国立美专、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和意大利罗马国立美术学院。这个不寻常的女人1928年学成归国,受聘担任了母校上海美专的西画系主任。

黄蜀芹把潘玉良的传奇拍成了一部电影《画魂》,这几天在家无聊,想在电影里找找乍浦路的影子,翻来覆去地看,倒是发现了一个绝望的冬天之后总有一个希望的春天。

率达百分百,那些浑水摸鱼的人难以承租房屋,田园派出所管辖的治安状况发案率直线下降,警力不再四处奔忙,服务管理社无疑是派出所的强而有力的“臂膀”。

派出所十号警务管理管数十万人口,莫说服务,连管理也难到位。但借助委托服务管理就产生意想不到的效率,派出所分出6个民警,就能妥当担负大量的信息采集和治安检查,派出所向用工企业提供打工者合法信息,那些企业也不再担心不法之徒混迹打工者队伍中。

服务社在出租房屋市场实现了共赢。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组当年采访这一综治创举,我深有感触地说:“警力有限,民力无限,市场像蕴藏民力资源的大海,我们应当面向大海,虔诚拜师,勇敢索取。”

明日请看我社区民警看《王老伯和小猫咪》。责编:杨晓晖